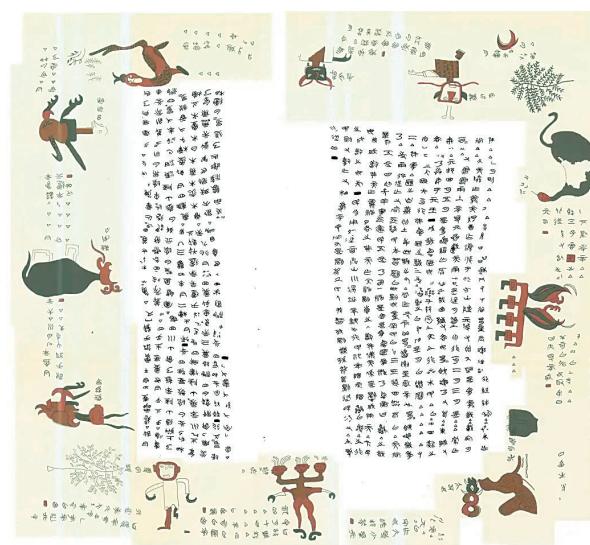


湘江头条

章法严整、典雅唯美:子弹库战国帛书的艺术特点

李莹波



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一卷《四时令》(摹本)。资料图



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三卷《攻守占》。资料图

2025年5月18日凌晨3时55分,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帛书——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结束在美国的79载漂泊,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回到祖国。10月13日,湖南省博物馆举办“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三卷划拨入藏仪式”。帛书回到了它真正的老家——长沙。既然是“书”,那么,许多朋友对它上面的字迹充满了好奇,就不足为奇了。

先看整体: 为什么写得整整齐齐?

从新闻图片上看,回归的这两卷帛书虽然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残片,但从文字形态上讲,与该帛书第一卷的甲篇《四时》、乙篇《天象》、丙篇《月忌》风格一致。因为其文本性质属于文献,所以其文字显得较为规整。尤其是对照第一卷中相对完好的甲、乙篇,可以想象一下这两卷残篇完整时的状况,应该也是排列整整齐齐,成行成列,非常美观的。

出土文字材料,学术界一般将其归为文书与文献两大类。文书一般包含日常书写的各个方面,如工作记录、户籍图表、日常书信、陪葬遣策等方面的数据,因其仅具交流沟通信息的实用价值,再加上往往多人书写,所以抄写随意、不拘一格。文献一般包括历史地理、诸子典籍、法律条文等方面的材料,因为内容严肃庄重,又具有传承价值,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这些文献的流传只能通过传抄,因此文献类的简帛,比一般的文书简牍抄写规范得多。子弹库战国帛书属于典型的古籍类文献,所以其章法布局整整齐齐,就顺理成章了。

与出土的其他楚简相比,子弹库战国帛书在章法上的严整独一无二:因为是唯一一件具有广阔的长宽维度的楚帛书,纵横成列的布局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清华简中一些先编联再书写的篇目,其整齐的程度稍可与其相较以外,其他楚简是单支竹简书写,因此很难兼顾到整体的效果。

再看单字: 为什么字形是扁扁的?

在战国晚期那个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乱世,日趋频繁的信息交流势必深刻影响日常书写。熟悉书法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先秦时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官方书体都是较为规整的篆书,其笔画圆劲、体势修长,比较典雅。但日常书写在狭窄的简牍上的文字,要做到修长圆劲是不容易的。而扁平趋势则容易得多,就像叠衣物一样,书写文字时只要排叠整齐,少留空隙,字的内部空间就不会显得凌乱,在适当拉开字距的前提下反而显得紧凑而美观。在这个思想的主导

下,篆书的弯曲婉转就显得累赘了,字势扁平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改变就是用笔直率简洁。因此,追求“简洁而美观”成了那个时代的共同心理趋勢。

郭沫若在刚见到子弹库战国帛书时,看到帛书的字体扁方,用笔又略带波势,想到几百年后的汉隶也是如此,因此认为楚帛书上的文字是汉隶的滥觞。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一方面,体势扁平不是汉隶独有的特色。由于上述各国文字发展过程中体系出来的趋同倾向,无论是楚系文字还是秦系文字,都发展出一类趋向扁平体势的书风。

其中秦系文字的这类书风,早在四川出土的书于秦武王时代的“青川木牍”上就已经出现了,学者称之为“秦隶”。

而汉隶就是从秦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种书风发展的趋同性使得汉隶与楚帛书在体势上类同。

这种演化中的趋同性,有点类似生物界中生物形态进化的趋同性,比如不同物种“外形蟹化”的现象。

生物界中这种进化倾向证明趋同进化的对象一定具有较大的生存优势。

我们再看书体的演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道理可讲呢?

另一方面,楚、汉文字不属于同一个体系。楚帛书所处的年代是战国晚期,所属的文字体系是战国古文。而汉隶的源头是秦系文字,秦文字与战国古文虽同出于西周文字,但战国晚期两者的发展路径已经分道扬镳,它们类似于“老表”关系。作为几代单传最后终于绝嗣的楚系战国古文,它很不幸地失传了,因此汉隶不可能与它有多大关系,它充其量只是个汉隶的远房长辈罢了。郭沫若把汉隶想象成是楚帛书的后代,看来是太过仁慈了。因为楚系文字在秦灭六国后失传,现存于出土简帛中这些楚系文字成了真正的绝响,因此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审美价值。

精看细节: 为什么笔锋是尖尖的?

古人在追求“简洁而美观”的审美过程中,除了在文字的体势上做出了合乎自然的简省改变,在书写技法上也做出了相应调整。饱墨状态下直接顺锋落笔,再急速行笔写出较细的线条,收笔时回环出尖以自然带出下一笔,这是所有楚系简帛书法的基本笔法特点。这种笔势显得头重尾轻,灵活流动,就成了古人文献中所谓的“蝌蚪文”。

楚系古文的这种书写特点还与工具有关。大家如果去看看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毛笔,或许能得 到一些启发。长沙楚笔是用圆竹条,用丝缠绕,外面封漆固定,和现代的毛笔制作工艺有很大不同。这种笔,笔头会

有一定程度的空心,为了避免书写过

程中出现分叉,只能延长笔毛的长

度。所以细长而空心的楚笔,就更适

合书写出顿挫分明而富有韵律的线

条了。

子弹库战国帛书的书写技法极其实高超,与同时代的楚简相比,既有类似又有区别。在帛书出土以后,祖国大地陆续出土了多批次的大量楚简,这些楚简上的文字风格迥异。有的典雅柔美,如“安大简”;有的端正挺拔,如“清华简”;有的精致俊俏,如“上博简”的《孔子诗论》;有的厚重婀娜,如“上博简”的《容成氏》;有的婉转华丽,如“郭店简”的《成之闻之》;有的荒率纵逸,如“包山简”……

子弹库战国帛书的整体书体面貌,非常接近安大简。字势扁平工整,富有典雅的基本气息。笔势弧度明显、富有弹性,收笔回环处又与包山简的率意相似。由于书写材料是柔软而略带吸水性的绢帛,比起书写在竹简上的凌厉笔锋,楚帛书的笔锋要含蓄得多,有种绵里藏针的力度感。绢

帛质地柔软,因此楚帛书在行笔过程的跳动感也减弱了,显得更加平和悠游。综合起来,楚帛书的书风如安大简一般典雅,但在唯美性上比安大简还要略胜一筹。

回看全篇: 为什么很难读懂?

看新闻图片大家应该还有个最直观的感受:回归的子弹库楚帛书残本,字迹不多但很难读懂,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文字体系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我国的文字从商周时代开始,一脉相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诸侯分治,我国的文字体系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内部分化,形成了秦、齐、楚、晋等各个主要的派系。

其中,秦系文字较为保守,更多地保留了商周文字的特征。六国文字则变化得更加剧烈,形成了王国维所说的“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基本局面。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字体系,是直接继承自秦系文字的。虽然秦系文字经过了隶变、草化、楷化、简化等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国家规范汉字,当再去读出土的秦代简牍文字时,甚至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普通老百姓多少还能看懂一些基本词汇。但去读楚系古文字就很难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楚系文字是我国文字发展中的旁支,已经脱离了汉字发展的主流,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隔阂是天然存在的。即便是专业的古文字学家,要通读楚帛书上的文字,也极为困难。也正因如此,子弹库楚帛书中,才蕴藏了更多的古人的秘密,成就了更多的未解之谜。

今天,我们要去深入地研究楚帛书、楚文化,还需要许多人更多的不懈努力。当然,作为普通观众,我们还是先从这一道道残留的笔迹中,去感受古人浪漫的韵律吧!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长沙师范学院副教授)



当年赤帜展绿洲

王胜芳

简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征战绥宁指挥所旧址位于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政府所在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指挥所旧址记录了红七军的峥嵘岁月。1930年12月,红七军战士,在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领下攻占绥宁大捷。至此,绥宁广袤的山水,摄下邓小平当年的青春风采,刻下红七军战士英勇的革命足迹。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征战绥宁指挥所旧址。

作者供图

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率湘桂黔三省兵力,对红七军围追堵截。邓小平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原计划,决定红七军主力提前结束休整,于12月23日离开寨市,经长铺、关峡、梅口等地向武冈进军。

“红旗漫卷西风”。红七军征战绥宁的经历,“红七军大事记”有明确记载。邓小平女儿邓榕著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有详细记述。绥宁,是红七军的福地。这段历史,是绥宁人民得到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各级文物部门给予不少指导,绥宁对指挥所旧址进行了保护修缮,于2023年11月再次正式免费对外开放。

三

指挥所旧址修缮之后,仍保留了龙家祠堂的原貌,砖木建筑,纵分三进,马头墙外包围白墙翘檐,墙内以木材搭构,黑瓦盖顶;进大门的第一进,是二层楼的戏台;第二进,中间天井敞亮,左右厢房平起相对;最后一进,设为正堂,是主持祭祀、议事的地方。走入祠堂,每一级台阶,每一块地砖,每一处榫卯,古拙庄重。祠堂正门右侧,“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指挥所旧址”铭牌,烫金入目。大门正上方写着“龙氏家祠”四个大字,门柱刻联:“平南世泽耀屏翰,莳竹千秋隆祀裡。”平南,指当地龙氏宗祖龙宗麻,原籍江西吉安,宋元祐年间,他奉朝廷之命,率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起义有功,受封平南侯。为纪念龙宗麻父子,当地多处建有“平南侯”祠庙。

修复后的指挥所旧址陈列着红七军当年征战绥宁概况,介绍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生平,复原了三位将领住宿、开会议事的场景。步入场景,自觉有一股强大的青春力量扑面而来。当年,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征战绥宁,三人的年龄分别是26岁、34岁、38岁,红七军战士大多数也正值青年。

西河街大体呈南北走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边,紧挨着一排排二层楼木屋古民居,开店居住一条街,讲述着昔日的繁盛。街心建有红七军征战绥宁大捷战斗浮雕。

街北头建有西河桥,原名“万年桥”,因红七军战士曾在桥上休整又名“红军桥”。桥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曾毁于大火。2009年,此桥由乡贤捐资以原貌重修。它是一座典型的侗族风雨桥,整座桥梁结构复杂,穿插有序,无一钉一铆,展现了工匠的高超技艺。桥下为石砌立墩,桥上架梁建廊,桥长50米,宽10余米,有两层楼高,飞檐翘角,蔚为壮观。

西河桥下,莳竹河碧水成潭,倒映青山。这条全镇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次森林,于茂林修竹间,流入巫水,汇沅江,下洞庭。国家级非遗“中国绥宁苗族八仙娘节”民俗活动,每年在莳竹河左岸隆重举行。

现在,寨市镇是湘桂黔边境各地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她宛如湘西南边陲的一颗耀眼明珠,成色更足,展现出新的吸引力,进入更多人们的视野。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95年来,红七军强大的初心之力,早已聚成绥宁这片土地的千山之翠,美丽的莳竹河奔流不息,永远讲述着这一部伟大的英雄传奇。

湘江观潮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抄袭不如抄书

刘诚龙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自述一段抄碑帖经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寄在这屋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里也遇到不少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便是我惟一的愿望。”

1914年4月6日,鲁迅先生“夜间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沈下贤是唐代文学家,这本书《文集》有诗也有文,抄持容易,抄文难。先生诗也抄,文也抄,这个夜里,抄的是目录。他立大志,要完完整整把这本书从头抄到尾,要把抄完的书,装贴成册。

先生是常常抄书,装贴成册的。1915年3月19日,“下午从稻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赴清秘阁买纸一元。”先生去买纸,花费一元,为的是来抄这本书。这是一些古文字,相当于字帖。十日抄完一卷,四十日把买来的纸用完了,4月10日,先生又去买纸:“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耗时二十二天把这本书抄完,然后呢?4月17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书。”把自己所抄的文字,托付专业图书馆装订起来。

抄古碑这般笨动作,也许只干了这么几年,鲁迅先生干得更长久的笨动作,是抄书。读鲁迅先生早年日记,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抄书,比如1931年10月1日,“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石屏集》是南宋戴复古的一本诗集,戴公终生未仕,浪迹江湖,其诗格调高朗,文笔俊爽,诗翁香价满江湖,鲁迅先生甚爱之。

先生抄这本诗集时,身体出了状

况,头昏目眩,神经衰弱。便在这般病态中,先生依然心摹手追,不倦抄书。先生毅力惊人,戴复古的这本诗集,他是从头至尾抄完的,耗时近三个月,抄了近三百页,用功甚力焉。

1914年4月6日,鲁迅先生“夜间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沈下贤是唐代文学家,这本书《文集》有诗也有文,抄持容易,抄文难。先生诗也抄,文也抄,这个夜里,抄的是目录。他立大志,要完完整整把这本书从头抄到尾,要把抄完的书,装贴成册。

先生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即使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先生抄书来看,他自己真是这般读书的。在30岁以前,除了读书外,他抄书是常常的事。有人统计过,鲁迅先生抄书,不低于百万字。

抄书抄了百万字,这个数目太惊人了。鲁迅先生抄书惊人与著书惊世,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有一番抄书苦,哪得著书举世香?先生在

《呐喊自序》里还有一段话,是与钱玄同先生的对话。钱先生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先生说:“没有什么用。”钱先生说,“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先生答:“没有什么意思。”钱先生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了。”

这段对话,挺有意思的。无用之用是大用,先生做了这许多无用功,才给他从事文学打下了大根基。钱先生叫他做些文章,他就从此写文章了。书非借不能读也,书非抄不能深读,书非深读不能著深文,不能著大著。

抄袭与抄书都是抄,抄袭快捷,抄书笨重;抄袭有乐也有苦,抄书有苦也有乐。抄袭是先乐后苦,文章一秒得(复制),改动三字成(换名字),这当然很快乐;抄袭苦起来,也是蛮苦的,一旦发现,身败名裂,一辈子都背负贼名;抄书是先苦后乐,吃得一番抄书苦,享受一生著书乐。从没有抄袭成大文人的,只有抄书而成大作家。作家都要吃苦的,抄袭者把苦乐次序搞颠倒了,先乐后苦,抄书者苦乐次序放对了,先苦后乐。美的文学与人生都是先苦后甜,丑的文学与人生才是先甜后苦。

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由著名的广西百色起义创建,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从广西河池出发,转战桂黔湘边境,向中央苏区转移。12月中旬,为获取补给,红七军在桂北重镇长安与白崇禧部激战七昼夜,伤亡500余人。为保存实力,红七军主动撤出战斗,向湘桂边境敌军实力相对薄弱的绥宁进军。

12月20日,红七军4000余人进入至绥宁南部的陇城、双江(两地今属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地。接着,兵分两路向绥宁县寨市奔袭,一路为红七军主力,由双江经多龙、大冻桥进抵寨市;另一路担任侧翼掩护,由双江经天堂界、大冻桥抵达寨市城郊,两路人马会合后,于21日凌晨向驻守绥宁县城的县保安大队发起攻击,敌人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国民党政府县长聂康济窜逃会同,红七军一举攻占县城寨市。

当日,邓小平等人在县城龙家祠堂设立指挥所,指挥一部分红军进至长铺和竹舟江一带布防警戒,并带领部队主力在县城休整,筹措粮款和冬衣。他们计划在绥宁扩充红军,相机发展游击根据地。红七军入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进步人士,没收豪绅及县府部分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书写标语、印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当地青年有几十人自愿报名参加红军。

红七军征战绥宁大捷,是我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自百色起义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扭转了此前一路辗转、连续征战不利的局面,极大地提振了部队士气。

国民党当局闻讯震动,蒋介石委任湖